



## 天津教育出版社第五编辑室副主任田昕： 编辑“大部头”是幸运

□本报记者 韩萌萌



田昕

150万字的《茅以升全集》、480万字的《严复全集》、50万字的《周秦奴隶制批判》、22万字的《屈传与屈赋研究》……在天津教育出版社第五编辑室副主任田昕编辑的图书中，很多书的字数都是以“万”“十万”甚至“百万”来计数的，而且这些书大都是入选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中宣部对外出版项目、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等，还多次获得国家出版基金优秀结项项目、天津市优秀图书奖、优秀天津地方文化图书等。

采访过程中，《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一边看着田昕编辑书稿的目录，一边粗略地估算出她最近几年每年大概要看500万字。在同事眼中，日常工作中的田昕，不是在认认真真地看稿子，就是在风风火火地跑选题，她对出版的执着与热情，体现在日常工作中的些微小事中，对经手的每一本书都毫无保留地倾注全部的感情。她说这是干编辑应该做的，自己只是无数兢兢业业一线出版人中的普通一员。

### 从一份工作到一份责任

1991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田昕，毕业时同时获得了历史学和法学两个学位。“本来我打算参加律考当律师，但是大学毕业总要找工作，正好有机会进入出版社，就很开心地来报到了。”当时的田昕对于编辑这个行业没有什么概念，“不知道编辑是做什么的。”

幸运的是，田昕一入行，就遇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和前辈。“是社里的老师们手把手地从最基础的常识开始，一步一步引导我走进了多姿多彩的出版世界。”田昕记得，带她的老编辑像导师给学生改论文一样教她读稿件，出版科的老师教她认识不同纸张、开型、排版规则和装订方式，美术设计老师给她讲图书设计与其他设计的区别，老师们带着她去拜访很多有建树的学者专家，在领导和老师的鼓励下，田昕不仅完成了从读者到编辑的身份转变，也得到了独立运作选题的机会。“这一切的一切，至今回想起来，我仍然满怀感激之情。”

田昕说：“对我而言，编辑从最初的一份工作，到现在的一份责任，用了快30年的时间，这其中喜悦、有荣誉，当然也有失落、有挫败。在这个行业的时间越久，越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不足，从而常常陷入自我怀疑，但无论怎样，只要不停下努力脚步，就会有收获。”

### 留下深刻印象的两本书

在近30年的编辑生涯中，有两本书给田昕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本是《编辑生涯四十年》，作者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老前辈董延梅。“当时我还是一名新手编辑，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既是书稿，也是教材，我很庆幸在我的职业生涯之初审读了这样一本稿件。作为编辑，我能为本书稿所做的有限，反而是它为我埋下了热爱的种子，让我开始对编辑这个行业有了最初的期待。”

另一个则是田昕的第一个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茅以升全集》，从2012年到2015年这3年的时间，完成《茅以升全集》八卷本。这套书全面搜集整理了茅以升的学术著作、科普文章、回忆随笔以及他一生各个时期的珍贵照片资料。田昕说：“每一幅图片的甄选，每一篇稿件的审读，每一个细节的落实，从立项到结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读者能够立体丰满地认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教育家。”

采访中，只要说到自己编辑的图书，田昕就会滔滔不绝地介绍立项的初衷、编辑的过程，对于编辑过程的细节更是如数家珍，可说到自己，却完全没有准备，总想把话题转移到图书出版上去。对她而言，“为他人做嫁衣”与其说是心甘情愿，倒不如说是一种幸运。田昕说：“出版，往大了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往小了说，就是有些东西要留给后世子孙留下来，有些事情总要有有人去做。当你抱着这样的心情去做一套书的时候，那些纷纷扰扰、功名利禄就自动屏蔽了。”

### 踏踏实实才能水到渠成

田昕表示，现在对于编辑的要求更高更全面了，她也理解很多年轻编辑在实际工作中会感觉理想与现实有很大差距，但她认为只要想象力和活力在，就会成长起来。“在让社科类、传统文化类图书更亲民、更接地气这一方面，年轻编辑做得也许更好，因此这么看来，做大部头图书项目也不需要坐冷板凳。”田昕说，自己做每一件事，习惯就每一项工作做个时间规划，中间留出机动时间，然后一步步推进。“在实际工作中，打乱计划的事时有发生，因此年轻人应该学会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面对一些特殊或者突发情况，尽可能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就好。”田昕表示，面对大部头的图书，年轻人既无须“望洋兴叹”，也不能抱有“临门一脚”的心态，踏踏实实才能水到渠成。

田昕也建议编辑扩大阅读量。“不同类型的图书看得多了就培养出了与文字的默契，另一个作用就是各类名词都能过一下脑子，就算记不住，看稿的时候也会有所提醒。”

# 儒者风范 山高水长

——追忆辞书学家黄鸿森

□刘伯根

转瞬之间，辞书学家、翻译家黄鸿森先生离开我们已经4年了。黄先生是我从事编辑工作的导师之一，于我帮助极大，也是我的忘年之交，与我感情很深。黄先生去世后，我一直想写一篇怀念的文章，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下笔，深感愧疚。

2020年2月20日，在度过了鼠年春节之后，黄鸿森先生在自己的家中安详离世，享年百岁。去世前，黄先生对自己的子女说，我看到了国家兴旺发达，感到了家庭幸福美满，此生无憾了。这算是好人自有福报吧。在疫情那个特殊的时点，我们无法前去告别、送黄先生最后一程，这是我们的遗憾。2022年1月13日，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我在黄先生长子黄一黎及其夫人的陪同下，专程前往八达岭陵园，祭拜黄先生，算是补送了黄先生一程。黄先生的赭红色墓碑下方，安放有一块同样赭红色的书本状石雕，其上镌刻有：黄鸿森，浙江瑞安人，中国辞书学家、翻译家，中国百科全书事业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荣获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中国首届编辑名家称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墓碑一侧，立有一块黑底白面的石碑，碑文用的是青年书法家陈义望书写的我的题词：桂冠驱愚丹铅契枣何必高官，志公行修知通统类可谓大儒。黄鸿森先生有记者、翻译家、辞书学家多重身份。

黄鸿森先生在青年时代做过十几年的记者，抗战时期，他作为《浙江日报》等多家报社的特约记者，赴前线写下了大量反映前线将士英勇抗敌、浴血奋战的报道，不断发出抗日救亡的呐喊。抗战胜利后，黄先生作为上海《大众夜报》《自由论坛晚报》的记者，兼为《大公报》《经济周报》《财政评论》《观察》等报刊撰写通讯和经济时评，撰写了大量抨击时弊的散文，无情揭露了反动政府的腐败。

新中国成立后，黄鸿森先生翻译了大部头的《苏联百科词典》《简明经济辞典》，主持翻译了《政治辞典》。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后，黄先生适应改革开放后亟需翻译引进外国学术名著的社会需要，翻译校订了苏联科学院主编的皇皇巨著《世界通史》及《近代史》等书籍。后来，黄先生在从事编辑出版之余，还陆续译校了《欧文选集》《圣

西门学说释译》《自然政治论》《黑格尔评传》《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神话辞典》等诸多学术著作及丛书。长期的、累计数百万言的翻译工作，使得黄先生在成为翻译家的同时，接触和熟悉了政治、经济、历史等门类的知识，还有辞书方面的专业知识。他积累的多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在现代汉语语法、修辞、逻辑方面的造诣，为后来从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黄鸿森先生最后一份职业是做编辑，包括退休之后还在做编辑审稿工作，前后做了40年。40年间，他编辑著述、种学绩文而不辍，以辞书学家和百科全书编纂家的身份守护了他一生最后的职业，成为一代编辑大师，也让我们见识到编辑真是一门崇高的职业。

在黄鸿森先生为《百科学术文库》中自己的那本《百科全书编纂纵横》所写的“后记”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当年是如何因缘际会，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开始他的辞书编辑生涯的：1979年初夏，黄先生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邂逅了多年未见的老友金常政，他是黄先生在北京翻译社的老同事张曼真女士的夫君。言谈中得知，他们夫妇都已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金常政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首卷《天文学》卷的责任编辑，张曼真担任翻译社室负责人，俱为中坚力量。黄先生就委托他们夫妇联名代为推荐，向大百科求职。过了几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阎复约见，并在见面结束时就明确表示希望黄先生立即参加我们的百科事业。自此黄先生就和百科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如今。

黄鸿森先生进入百科社后，先是参加百科首卷《天文学》卷的文字编辑工作，后来又参加了《环境科学》《力学》《矿冶》《交通》《建筑·园林·城市规划》等学科卷的编辑工作，为大百科第一版的顺利出版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我看来，黄鸿森先生对于百科全事业最重要的贡献有4个方面。一是参酌中外，发凡起例。黄先生协助姜椿芳、金常政等编辑家，参酌国际上现代百科全书的编纂方法，借鉴中国古代“类书”等的编纂经验，制定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体例，成为编纂百科全书的“施工图”。二是躬行践履，编辑示范。从《天文



黄鸿森

学》卷开始，黄先生参加了多个学科卷的编辑工作，逐渐积累经验，示范引导以后各卷。当时百科社办有一份内部学术刊物《探讨》，专门交流、研讨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包括姜椿芳、金常政、黄鸿森在内的许多编辑前辈都经常著文探讨，这些探讨使得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越来越成熟规范，也使得《编辑体例》越来越完善，更使得年轻的编辑有所学习、有所依照。三是审读把关，保证质量。百科全书是超大型工具书，编纂难度大、质量要求高。为切实保证质量，实行“内外三审制”和“六校次一核红制”。“内外三审制”即社外专家学者三个审次与社内编辑人员三个审次相结合，交叉进行。黄先生参加了20多个学科卷的审读工作，对于保证百科全书的编纂质量作出了特殊贡献。四是开辟新领域，拓展新境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是综合性百科全书。在此之后，黄先生还和其他同志一起，率先编纂了第一部“地区百科全书”——《黑龙江百科全书》，以后还编纂了《北京百科全书》《澳门百科全书》等；编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百科全书》《中国湿地百科全书》《北京京剧百科全书》等“专业百科全书”。他还参与审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参与指导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

黄鸿森先生是辞书“体例”和“释文”大师。他对于百科全书的条目设

计、条目交叉关系、定义和定性叙述形式、释文规范、参见系统、检索系统、大事年表等基本要素，对于历史、地理、人物、书目、事件等不同的条目类型，对于题和文、先和后、有和无、详和简、全称与简称、新历与旧历、照片与画像等诸多的稿件处理，乃至对于像古代遗址文物“遗存”与“留存”、古代地名“治今”与“辖今”的分辨等，都有专门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我很幸运，曾经多次向黄鸿森先生当面请教编辑问题，每次都能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往往还能别有所获。黄先生与我同住方庄，是近邻，我曾多次登门向黄先生请益，因此成了忘年之交。我的印象中，黄先生不光学识渊博，是“知通统类”的大儒式学者、编辑家，还是一位忠厚长者，一位谦和而健谈、睿智而幽默、时尚而不落伍的长者。黄先生曾经将自己的新著送上门来请我“指正”，当然是折煞我了。又一次，黄先生专门送来一块长方形的金黄色的蛋糕，说是蛋糕新品，唤作“金砖”是也。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吸食“金砖”。

有一次，黄鸿森先生听说我的孩子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便对我说，送下专门送来一块长方形的金黄色的蛋糕。黄先生回答说，胡适、蒋梦麟、金岳霖、马寅初、冯友兰、潘光旦、陶行知等人，都是哥大毕业的，后来都做了大学校长、院长了。照此类推，你儿子的出路不是明摆着的吗？这当然是幽默的话。黄先生当时已经90岁高龄，还能这样博闻强记，而且还能这般拐弯地幽默，让我大为惊叹。

黄鸿森先生活到老、学到老，是为学而不厌；既乐于当面启发后进，又能够著书立说指导后学，著述、译作甚为丰厚，是为诲人不倦；乐做编辑，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是为工匠精神；总是与时代同行、与社会同频，永不停滞，是为与时俱进；困境中不消沉，但有机遇便能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始终保持真挚、正直、乐观、幽默，是为活得自在、坦然、洒脱。

百科社的一位老编审楼遂曾在《光明日报》著文纪念黄鸿森先生，题目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今我学步楼遂，再次感怀：先生儒者风范，实在山高水长也！

（作者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 访谈

# 李昕：生平志业无二事 一心只为编辑痴

□本报记者 孙海悦



李昕

“我这辈子就当编辑。”10年前的一个夏日午后，即将卸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的李昕在办公室对《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这样说。10年后的一个春日午后，面对记者，他依然笃定：做编辑，是自己的“一生一事”。桌上放着的，是他的最新自传《一生一事：做书的日子（1982—2022）》。

### 成就经典 回望40年编辑生涯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您走过了40年编辑历程，这些中国出版高地也留下了您的名字，您也编辑了很多经典作品。请介绍一下这些经典之作。

李昕：40年间，通过为王蒙、李敖、杨绛、钱学森、杨振宁、王鼎钧、邵燕祥、傅高义、吴敬琏、冯骥才、刘梦溪、刘再复、杨义等编书，我与众多名家保持了长期的友谊。

《邓小平时代》《巨流河》《冯友兰作品精选》、李敖作品系列、《红楼四书》、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香港回归大事记》《平生六记》、《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版）等我以各种方式参与编辑出版的3000余本图书，因其总体上被社会、文化界和广大读者证明是有价值的好书。对于繁荣文化、传播知识、促进社会思想启蒙发挥了一点作用，我想我的自我考试是及格的。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您做过的书记录了您最重要的人生经历，其中凝结了哪些您对于历史、现实和人生的思考？

李昕：这些书就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我是受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的那一代人，对于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人生不可虚度”的名言记忆犹深，并常常以此自我鞭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格训练，使我有了一个好的起点；

难以做成的事情。

坚持出版有影响的好书，我想无非就是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特点进行策划。我赶上了出版业高速发展的时代，这40年，我始终与时代同行，在大时代中不断学习和进步。

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初，是出版价值回归时代，那时可谓“遍地是黄金”，只要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出好书。从90年代中期到2010年前后，是出版的新技术革命时代，电脑设计、排版、制作和印刷极大地丰富了图书的呈现形式，图文并茂成了一部分好书的显著特征，图书精美程度成为读者评价图书质量的标准之一。2010年以后，随着出版企业化、市场化的节奏加快，传统出版向多媒体出版转型也成为潮流。市场竞争越加激烈，而利用多媒体、自媒体手段营销也成了必不可少的手段。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在从事编辑工作的第40个年头，您的最新自传《一生一事》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其中饱含了您的阅历经验和生活智慧。与您共事多年的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郑勇称这本书是您的回忆录，更是传世可期的当代出版史。书中如何记录了您的职业历程和人生之路？

李昕：在我编辑生涯告一段落的时候，我的确需要给自己走过的道路理一条线索、做一次盘点，进行一次至少是阶段性的总结，《一生一事》也算是对我的一次考试。这是一本我试图总结自己人生得失、启发青年朋友的书，也是一本讲述出版背后故事的书。这本书是我编辑出版工作的回忆录，主要写了我与作者的交往和我为作者编书的故事，希望通过这些故事写出自己关于出版的一些思考。

李昕：在中国当代出版界，我属于“生逢其时”的一代人，而且是其中特别幸运的少数人。做出版是需要有好平台的，而我在先后4家著名出版社担任编辑，享受到这些出版平台带来的特殊资源和便利条件。时代和环境的双重因素，使我有机会做成了一些别人或许

### 见证时代 亲历出版业繁荣发展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生平志业无二事，一年四季做书忙。”在文史

学刘梦溪看来，这辈人只从事了一种职业，而这个职业符合您的人生理想，也成了您为之奋斗的事业。《一生一事》中传递了您怎样的出版理念？

李昕：我的很多出版理念是多位前辈出版人通过言传身教留给我的，对我一生影响至深。例如，何为三联传统的精髓，我是从老一代出版家蓝真身上读懂的。在书中，我还写了自己的一些固执和坚持。对于那些不得不讲的故事，我尽力将文字收放，以讲事实为主，少做评论，以尽可能保持客观。

真正做一个好编辑，是要用一生去追求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文化理想不可放弃，个人努力不可或缺。做出版、出好书，是不能怕麻烦的，还要有一点完美主义。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您在多次与青年编辑的对话中都谈过如何做成一个成功的编辑。您对今天的青年编辑有哪些建议？

李昕：想做一个成功的编辑，就要反思一下自己对待好稿是什么态度，这可以判断自己是不是富有激情的编辑。激情是从哪儿来的？激情由爱而生，爱什么？爱编辑这个职业、岗位、爱书、爱读书，因为好编辑百分之百都是爱书人。因为爱书，所以一心要编好书，发现好书就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有时候进入痴迷状态，全情投入，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书编好。反过来说，激情也在引导和鼓励编辑发现好书，激情也是一种动力。

作为一名优秀编辑，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理念，一个是感悟。所谓理念，就是要出好书，出有品质、品格、品位、品相的书，用这些书传播知识和文化、引领社会潮流、促进社会思考，从而推动社会进步。所谓感悟，就是要形成良好的书感，知道什么样的书稿应该怎样编辑，什么样的内容和什么样的形式相结合，才可以把书做得既符合规范又有所创新，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青年人把做编辑作为一生的事业来选择，应该不会后悔。

### 出版理念 理想不可弃努力不可缺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生平志业无二事，一年四季做书忙。”在文史